

《台灣民報》中關於民間宗教活動的論述 ——兼論「霸權與反抗運動」理論

林佩欣*

《台灣民報》是林獻堂等人於1921年所創辦的報紙，創刊的宗旨在於促進台灣同胞民智，傳播東西文明，作為島內民眾的先聲，其揭櫫之宗旨在於「謀台灣文化之向上」；因為《台灣民報》特殊的政治立場及訴求，對於日本殖民統治採取的是敵對與仇視的態度。民報中，對於台灣傳統的宗教活動及迎神賽會，皆不以為然，均認為那是迷信的產物，傳統的宗教活動、神明遶境、中元普渡等，都是迷信的行為，而因為神明祭典而大加鋪張更是奢侈浪費；迎神慶典中所扮演的歌仔戲，更將其視為淫亂的戲劇。知識份子們認為這些奢靡的風氣，皆為日本殖民當局為了消靡反日的情愫，攏絡人心，而刻意放任的結果，乃在《台灣民報》中大加的批判。

知識份子們透過各式各樣的活動，鼓吹消弭迷信，嚴禁低俗的文化，以建立一個高品質的新文化，因而有了新劇運動的產生。這樣的論點，在Peter Burke (*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的概念中，可以運用「霸權與反抗運動」方面來闡釋，他們以為，宗教信仰是統治者針對被統治者所進行的社會控制，透過攏絡民心，來強化其統治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基礎，而《台灣民報》便是爲了破除迷信而發聲的反抗運動。Peter Burke的概念中，僅只強調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二元的關係，在《台灣民報》當中，卻有知識份子的立場。那種既不是統治者，對下層民眾文化又深惡痛絕的中間份子，就史實來看，其實有著長遠的影響，地位亦不容忽視，因此，日治時期台灣的殖民社會，無法用Peter Burke二分法的理論清楚地加以闡述。

關鍵詞：《台灣民報》、民間宗教活動、殖民本質、霸權、反抗運動

一、前言

《台灣民報》是林獻堂等人於1921年所創辦的報紙，創刊的宗旨在於促進台灣同胞民智，傳播東西文明，作爲島內民眾的先聲。¹1921年10月17日，台籍知識份子在台北成立「台灣文化協會」，揭櫫宗旨「謀台灣文化之向上」，協會推林獻堂爲總理、楊吉臣爲協理、蔣渭水爲專務理事；台灣文化協會除了在政治活動上積極支援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外，也展開各式的文化活動，扮演啓迪民智、喚醒民族意識及加強社會觀念的先鋒角色。²

就發起台灣文化協會的本土知識份子而言，他們對日本的殖民政府深惡痛絕，一心一意地想以發起社會活動、提倡社會新文化、改革不良風氣爲利器，對殖民政府做出反抗。知識份子們透過《台灣青年》、《台灣》、《台灣民報》等等刊物，一方面抨擊同化政策不當、要求改革殖民體制，一面又積極介紹當代西方各種思潮和知識，扮演文化啓蒙的角色；³他們在台灣本土，提倡了所謂的新文化運動，標榜高格調、有水準的新文化。

¹ 楊翠，《日據時期台灣婦女解放運動——以台灣民報爲分析場域》（台北：時報出版社，1993），頁80。

² 張勝彥、吳文星、溫振華、戴寶村，《台灣開發史》（台北：國立空中大學，1998年8月），頁284-285。

³ 張勝彥、吳文星、溫振華、戴寶村，《台灣開發史》，頁257。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台灣民報》作為「台灣人唯一言論機關」的報紙，在報導台灣傳統的民間信仰、迎神賽會相關活動時，會以什麼樣的心態去詮釋這些報導？而一般的知識份子，對於台灣傳統的宗教活動，表現在社論當中的看法，持的又是什麼觀點？總括說來，就知識份子的立場而言，一般庶民大眾所信仰的傳統民間信仰、或是迎神賽會活動，是不為其所包容的，攤開《台灣民報》，對於民間信仰或是廟會活動，甚至是傳統戲曲，幾乎沒有一句好話，不是斥之為迷信、蔑其為鋪張浪費，便是認為那是殖民政府利用來攏絡人心的手段。

本文便是以台灣傳統的民間宗教為題，對《台灣民報》當中的相關論述，做出若干探索，企圖從史料當中，檢視出知識份子的反教心態，及對當時台灣社會的教化用意，並且針對民報當中知識份子對於宗教活動的論述及看法，以Peter Burke在*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一書中的概念，一窺殖民政府的統治本質。

惟在《台灣民報》當中發表或是報導此類文章的論者，多不著撰人，而若干有記載大名的，一來不確定其是否為本名登錄，二來無法追溯投稿者的相關背景資料，這對於史料的評介與分析工作，增加了困難度；因此，筆者將《台灣民報》當中的相關論述，加以綜合歸納，藉以呈現出《台灣民報》整體的基本精神與反殖民政府的立場。

二、《台灣民報》中對於宗教活動的論述

傳統的台灣民間信仰，有別於一般具備創教教主、教理體系、教團組織及經典教義的既成宗教或民間教派，主要是以祭拜天地神鬼之信仰需求所展開的公眾祭祀為主，兼以一些個體性的求神問卜行為，它與庶民生活貼切地應合。⁴台灣民眾對於傳統民間信仰的崇拜，始自於清代的移民時期，由來已久，可說是漢人社會生活中重要的一環。

⁴ 林美容，〈台灣民間信仰的分類〉，《漢學研究通訊》，10卷1期，1991年3月，頁14。



而且，有廟便會有廟會活動，廟裡的神明一旦過生日，地方頭人爲了表示對神明的敬意，必定會號召村民大肆鋪張以資慶祝；而廟會慶典更需要戲團、子弟陣的助興才會熱鬧、過癮，台灣人有著愛熱鬧的本性，趁著神明生日，大加舉辦慶典活動，一來可以藉機表達對神明的敬意，二來又可宣揚地方角頭的財力，三來更可以藉機與其他祭祀圈的民眾交流情感。這樣的盛況，在日治初期，絲毫沒有改變，反而在殖民政府的大加獎勵之下，甚至有愈演愈烈的態勢。

在《台灣民報》當中，關於民間宗教活動的論述，可以約略區分爲對於遶境的報導、中元普渡的記述、對於迷信的抨擊、以及對歌仔戲的批評。在《台灣民報》中，關於宗教活動的消息，除了有地方通訊的報導，還有時人針對大型廟會慶典，如建醮、中元普渡、神明遶境等等活動所做的評論，其中也不乏一些針對當時民眾一些宗教行爲的看法或感想。

《民報》當中，對於傳統的宗教活動、迎神賽會，或是民間戲劇表演，幾乎沒有一句好話，不是斥之爲迷信，便是諷刺爲殖民政府籠絡民心的手段，藉以麻痺民眾的抗日情愫；針對當時庶民最喜愛的歌仔戲表演，更蔑視爲表演低俗、腐化人心而大肆口誅筆伐；而對於廟會活動的主力——子弟陣，則斥之爲遊手好閒，到處興風作浪、擾亂治安的暴民。

《台灣民報》中就記載著，「台灣自風景上來說，是美麗島；自風俗上說，卻是迷信島。我們在台北幾乎每日看見所謂善男信女，有的捧香爐，提著紅燈；有的抬著神輿，捧著香，前頭必有吹打……投無數的金錢於有絕對之害的迷信。」⁵評論者認爲，台灣島內的民眾迷信神佛，已經到了無法自拔的地步，對於社會風氣敗害許多，更視台灣爲一個全民皆沉迷於廟會慶典的迷信島看待。他們反對宗教活動，認爲宗教活動所帶來的弊害有許多，除了助長迷信以外，更造成浪費、鋪張及衛生問題，「所謂媽祖的遶境，實是擾

⁵ 不著撰人，〈迷信島〉，《台灣民報》，第82號，「小言」，大正14年12月6日，頁8。



境，媽祖所過之地，無不受其擾。」⁶

知識份子更認為，之所以大力鋪張地舉行宗教慶典活動，是殖民政府的手段，當局利用宗教來籠絡人心，知識份子也抨擊若干御用紳士甘心成為殖民政府統治的工具，而大力地進行宗教活動。在《台灣民報》的社論中，便有相關記載，「不消說，迷信於人民是毒藥。我們可憐的台灣人在吞毒藥自殺，而我們的政府和言論界站在那裡拍掌喝采。唉！他們是想做看台灣人的血肉橫飛以為樂的，而一般愚夫頑民不能察其本意，到反以為受寵若驚，洋洋得意，不自知其末日之將至，真是蠢的太可憐了！」⁷

不僅如此，他們更認為迎神賽會之所以會普及，是有一些御用紳士的虛榮心作祟，政府當局亦大力協助，「我前日過嘉義在車站搭車將北上的時候，剛剛碰著民雄庄的大士爺舉行祭典的日子，一般無智識階級的善男信女，聯袂將赴該處參拜，形甚擁擠。鐵道部對於這一舉，也很獎勵。車站的前面，臨時架起香客休憩所及臨時售票處和加發臨時車幫……獨要問鐵道部對這種事也可獎勵嗎？」⁸「稻江的霞海城隍，每年祭典的盛況……當迎神繞境的時候，警署就加派警察於各處幫忙，些毫不加以非難，這就是當局對於迷信的有意提倡的一個證據吧！」⁹時人對於殖民政府所展現出的種種提倡、獎勵，甚至贊助民間信仰的措施，無不透過《台灣民報》大加口誅筆伐。

知識份子們也批評當時支持歌仔戲的地方士紳，認為他們是御用紳士，社會的敗蟲，「基隆唯一的戲園新聲館，自去年以來每天所演的大半是歌仔戲，因此那些輕浮的青年男女無不爭先恐後……，而在一方面極力主唱風俗

⁶ 不著撰人，〈看了稻江、萬華的迎神賽會作的〉，《台灣民報》，第61號，「論評」，大正14年7月19日，頁2。

⁷ 一郎，〈駁稻江建醮與政府和三新聞的態度〉，《台灣民報》，第2卷25號，「評論」，大正13年12月1日，頁5。

⁸ 一郎，〈駁稻江建醮與政府和三新聞的態度〉，《台灣民報》，第2卷25號，「評論」，大正13年12月1日，頁5。

⁹ 文杞，〈迷信也可以獎勵和提倡嗎〉，《台灣民報》，第2卷19號，「評論」，大正13年10月1日，頁6。



改良的所謂紳士們，非但不干涉，聽說他們所謂一流紳士們每夜都結伴攜妓前往觀看云云。唉！像這樣陽是陰違，戴假面具的社會害蟲，民眾當要排除之，而把那敗壞風氣的歌仔戲驅逐出境才是。」¹⁰還有一些商人，想要藉著祭典活動大發利市，「或有一部份的商人，利用於挽回市況，每受此等人的提倡，迷信便愈鬧愈盛。」¹¹

《台灣民報》用各種宣傳、挖苦、勸告的方式，宣導民眾不要相信迷信，不要因為宗教活動而太過鋪張，更有感於台灣島內民眾迷信風氣的盛行，還做了「改良敬神歌」一百一十二首，印刷了五萬部，分送到各地去宣揚以破除迷信。¹²更在報紙中懇懇告誡舉辦廟會的頭人們，身為民眾的代表者，負有促使地方進步和為民眾謀福利的責任，「該要覺悟時勢，用遠大的眼光洞察大局，挾有批判的態度，不可拘泥於在來的道德和習慣，崇奉那些無形骸的宗教為天經地義」，¹³更要他們多加反省。

迎神賽會的兩大主力，便是歌仔戲團與地方的子弟陣。歌仔戲因為是閩南語配合南北管的伴奏，再加上通俗的情節，因此很容易得到民眾的共鳴，因而在民間頗受喜愛，但是卻受到知識份子的批判，認為歌仔戲是一種低俗的文化。原因是因為演員的人格很卑劣；歌調很淫蕩，所用的樂器又很低級，調子也很淫蕩，使得一般的男女聽了以後，會挑撥邪情，所唱的歌詞也很邪淫，失去了演劇的本義，反而使得青年男女受惡感化；他們認為演員的表情都很猥褻。¹⁴

「我人每次看了台灣戲便長嘆臺人的藝術的興味之低劣。至於歌仔戲則

¹⁰ 不著撰人，〈敗俗的歌仔戲盛行，民眾宜驅逐出境〉，《台灣民報》，第206號。

¹¹ 劍如，〈對稻江建醮的考察（上）〉，《台灣民報》，第2卷24號，「評論」，大正13年11月21日，頁4。

¹² 不著撰人，〈頒布改良敬神歌〉，《台灣民報》，第129號，「時事」，大正15年10月31日，頁7。

¹³ 簡順福，〈就此回的建醮而言（求當事人要有反省）〉，《台灣民報》，第2卷第25號，「評論」，大正15年10月31日，頁8。

¹⁴ 不著撰人，〈歌仔戲要怎樣禁？〉，《台灣民報》，第139號，「論評」，昭和2年1月9日，頁4。



簡直是挑撥性慾，示唆淫褻的媒介，並且是有利的媒介，難怪它能盛受歡迎於村婦村男之輩。其毒害社會風化之深可想而知了！」¹⁵知識份子一方面對於傳統的戲劇文化大力抨擊，一方面又在報紙中鼓吹新型態的戲劇與新文化，標榜高品質與高格調，藉以與之一較長短。因而，報上也常出現台灣文化協會所舉辦的各式文化活動，及在地方上不遺餘力地抵制傳統民間信仰或是戲劇的消息。

而子弟陣是廟會慶典中擺出陣頭，通常由村廟祭祀圈中的民眾負責，他們平常練習陣頭，遇有神明生日，便可以出陣排場助興。往昔，民眾習慣將村中曲館的成員們通稱為「子弟」，意為村中的子弟，¹⁶他們是業餘的組織，因為個人的興趣或是村中頭人的號召而組織樂團、參與村廟的廟會慶典事宜。西皮、福祿是基隆、宜蘭地區北管子弟陣中最大的兩個派別，自清道光年間傳入台灣以來，由於戲曲活動的普及，曲館紛紛成立，西皮、福祿兩派分裂對抗的形勢也愈來愈嚴重，除了在廟會慶典時因為「輸人不輸陣」互相拚陣之外，動輒有互相鬥毆、械鬥的狀況。

到了日治時期，由於殖民政府的攏絡政策，大力地獎勵子弟館，使其互相競爭；因為政府的鼓勵，各庄紛紛成立子弟館，招募曲師傅授鑼、鼓、鈸、胡琴等樂曲與曲譜，¹⁷雖然他們平常迎神賽會時各自運作，但每每卻因為各自曲風的不同而互相叫陣，各曲館不但互相誇耀陣頭的華麗來對抗，平常亦劃橋為界互相仇視，其中若有一方與以挑釁，則往往會爆發流血衝突，甚至會混入一些平常在街頭橫行的混混，假借西皮、福祿之名鬧事，¹⁸也因為如此，西皮、福祿原來只是單純的曲風之爭，卻也演變為角頭、幫派的勢力之爭。

¹⁵ 不著撰人，〈六千零六號注射〉，《台灣民報》，第100號，「小言」，大正15年4月11日，頁7。

¹⁶ 林美容，〈有人愛做憨子弟〉，《台灣文化與歷史的重構》（台北：前衛出版社，1996年8月），頁255。

¹⁷ 周榮杰，〈西皮與福祿之爭〉，《史聯雜誌》，10期，1987年8月，頁86。

¹⁸ 王一剛，〈西皮福祿及軒園之爭〉，《台灣風物》，23卷3期，1973年9月，頁8。



在《台灣民報》當中，也不乏對於子弟們打架滋事的報導。「兩保正原來嗜好出風頭的人物，他們讚稱子弟戲……獎勵街內少年學做戲，致使青少年學業荒廢，不專事業，而街風受他們弄壞了。」¹⁹還有報導西皮、福祿二派互相鬥毆甚至結為一夥欺負百姓的消息，「基隆郡瑞芳續山九份西皮與福祿結成一團，對別地方來瑞芳謀生之人，若不與他交結，俱視為仇敵……一般庄民莫不為之寒心畏縮。」²⁰知識份子們不斷地藉著《民報》中的報導，企圖喚起民眾的社會自覺，希望能夠正視歌仔戲、子弟陣敗壞地方風氣、擾亂社會治安的事實。

綜上所述，《台灣民報》中對於宗教活動或是地方戲曲、賽會陣頭的看法，多持否定的態度，認為那是迷信，是統治者或是御用紳士、不肖商人利用來收攬民心、或趁機藉以斂財的器具，甚至是殖民政府蓄意腐化社會與人心的行為；而宗教慶典活動所造成的種種問題如衛生、鋪張等，更應加以改進，知識份子們並奉勸民眾不要再如此執迷了。

三、《台灣民報》中關於宗教活動的報導分析

在《台灣民報》當中，台灣知識份子對於民間宗教活動的大力批判，追根究底，實是與民報自身的政治立場有關——為了反對日本殖民統治而來。他們認為台灣民眾誤信了日本殖民當局籠絡人心的詭計，將腐化人心的迎神賽會當作是神聖的儀式進行，且有愈加嚴重之態勢。

也因為如此，民報在選擇新聞題材，或是社論內容時，為了收取矯正民心的效果，關於民間宗教的相關報導，多是記載負面消息，不是遶境擾境、就是子弟陣滋事的暴力事件；於社論之中，也只刊登時人對於傳統民間宗教的抨擊文章。一連串的动作，無非是為了抵制日本政府的殖民統治。在*History*

¹⁹ 不著撰人，〈保正狂熱子弟戲（街風大被弄壞了）〉，《台灣民報》，第110號，「小言」，大正15年6月20日，頁6。

²⁰ 悲觀生，《台灣民報》，第179號，「不平鳴」，昭和2年10月23日。



*and Social Theory*一書中，Peter Burke有一個議題是可以拿來與《台灣民報》中，關於宗教活動相關論述互相闡釋的，那就是「霸權與反抗運動」。

在*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一書中，關於霸權與反抗運動這個議題，Peter Burke重點主要在「精英文化」及「大眾文化」兩方面，他把「精英」和「民眾」用「統治者」和「低階層的民眾」加以取代，分析兩者間的社會控制和文化霸權。Peter Burke提到，「社會控制」是傳統社會學的字眼，是用來形容權力在社會上，透過法律、教育、宗教等等而運作的情形，義大利的Gramsci將統治者的社會控制稱為「霸權」；他的理念在於，統治者並非靠力量統治，而是靠說服，這種說服是間接的，下層民眾透過統治者的眼光，感謝殖民地的教育和其在體制中所處的角色。²¹

在《台灣民報》當中，知識份子之所以如此地排斥民間宗教，有一部分原因，即是因為他們認為那是殖民政府利用來籠絡民心的工具，殖民政府藉著默許或鼓勵民間信仰的方式，來討好台灣民眾，使其漸失防備，以達到社會控制的目的。有一個明顯的例子，即是台灣文化協會所倡導的新劇之發展。「一群無政府主義青年，結合同好，以戲劇為媒介，投入社會文化運動，開台灣新劇運動的先河，此後，新劇運動配合以台灣文化協會為主力的民族運動，扮演著文宣隊及戲劇改良者的角色，稱為文化劇。」²²台灣新劇運動興起的時間大約與歌仔戲略同，兩者發展卻有所不同，文化劇是配合台灣文化協會的藝文活動而來，知識份子們提倡文化向上，與歌仔戲通俗的取向，明顯地作區隔。

文化劇興起的原因之一在於反對舊戲，把傳統戲劇看做是影響台灣社會進步的陋俗，但是在知識份子心目中高格調的文藝活動，發展卻一直不順遂，而歌仔戲卻迅速地風靡全台，新劇則一直停留在斷斷續續的業餘演出。雖然新劇運動有崇高的理想，但理想卻是曲高和寡，知識份子們因而對傳統

²¹ Peter Burke, *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U. K.: Polity Press, 1992), pp. 84-85.

²² 邱坤良，《舊劇與新劇——日治時期台灣戲劇之研究》（台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1992年6月），頁295。



的歌仔戲愈加批判，甚至認為在1920年中期以後，台灣歌仔戲的勃興，是日本殖民政府怕文化戲深得民心，不易駕馭，因而暗中獎勵歌仔戲的演出，欲取新劇而代之，所以歌仔戲的成就才會高過新劇。²³

對知識份子來說，殖民政府對於傳統民間宗教及迎神賽會的大加獎勵，事實上便是當局實行社會控制的一種手段，當局藉此來攏絡民眾，令民眾順服易教化，對殖民政權失去防備，他們得以進一步地穩固其統治基礎，「日本統治者即企圖利用寺廟、神明來增長台灣人的迷信與浪費，圖謀藉此阻擋台灣民族資本的發展……以謀求其殖民統治的利益。」²⁴，它更是一種「視為社會一致性的加強和重建越軌行為所破壞的社會機制。」²⁵

甚至，殖民政府一方面為了攏絡人心、消弭抗日的情結，他們大力地贊助迎神賽會及宗教活動，而另一方面對於文化協會所創辦的文化劇卻又加以禁止；因為新劇所隱藏的政治訴求，使得殖民政府大為棘手，為了遏止如火如荼的新劇運動，日本當局甚至暗中警告戲園主人不得出借場地，又規定演出的劇本必須先送當局審查，通過後才能排演，即使獲准演出也是百般刁難。²⁶殖民政府對於戲劇演出的多種箝制，對歌仔戲卻不見禁止，對於新劇卻多所束縛與刁難，對當時的知識份子來說，其實是另一種文化霸權的表現。因此，不難想見，知識份子為何會在《台灣民報》當中，對於宗教迷信問題作出一系列批評，而又盡力地為文化劇作辯護，其實這就是在對殖民政府的霸權作一反撲，所進行的反抗運動。

四、關於Peter Burke「霸權與反抗運動」概念中的侷限性

雖然在*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中，Peter Burke對於霸權與社會運動的解

²³ 邱坤良，《舊劇與新劇——日治時期台灣戲劇之研究》，頁325。

²⁴ 陳玲蓉，《日據時期神道統治下的台灣宗教政策》（台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1992年4月），頁88。

²⁵ Peter Burke, *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 p. 85.

²⁶ 邱坤良，《舊劇與新劇——日治時期台灣戲劇之研究》，頁315



釋，可以清晰地解釋《民報》當中，知識份子與殖民政府之間的角力，也可以解析出關於日治時期日本殖民政府對於台灣的統治本質。但是進一步地將它運用在《台灣民報》中關於民間宗教活動的議題上，卻也有著侷限性。

在*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一書中，Peter Burke所謂的霸權與反抗運動之概念，關於統治者的社會控制說，提到了Pierre Bourdieu的「暴力的象徵」，也就是說強迫被統治者接受統治者或是領導階級的文化，而揚棄自己的文化，特別是將統治者的統治文化視為合法，而自身的文化則為非法的概念。

將這個論點，放在台灣殖民歷史當中，關於民間宗教的議題來談，歷史情境卻不盡相同。事實上，在日本對台的殖民史中，除了皇民化時期嚴格的「寺廟整理運動」之外，在皇民化之前，雖然日本大量引進其本土文化，但是在當時卻未將台灣的傳統文化加以禁止，反而是透過懷柔的手段，接受台灣本土的民間宗教信仰，甚至為了籠絡人心而大肆地宣揚。在1896年1月18日，樺山資紀發表有關對台灣固有宮廟保存的論告，下令保護台灣島內的寺廟；1898年更正式地頒布法令，承認台灣傳統的宗教與舊慣習。這樣的一個措施，不僅使人人皆沉溺在鑼鼓喧天的節慶氣氛中，也忘記了殖民政府所帶來的迫害。因而在《台灣民報》當中，就有許多這樣的文章，是在抨擊宗教信仰是殖民政府用來腐化人心的器具。因此，雖然同樣是統治政府社會控制的手段，但是所實行的策略，還是各有巧妙之處，不盡相同。

另外，在Peter Burke的概念之中，對於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概念，其實是有問題存在的。Peter Burke所強調的霸權和社會控制的理論，是將社會分為兩個簡單的階層，也就是所謂的「統治者」和「低階層的民眾」，或是「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²⁷因為他所強調的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只有上層與下層之間的互動，但是這樣簡單的分類，卻使他忽略了其中的中產階級或是知識份子。他或許是假設殖民地中的知識份子皆是與下層民眾站在同一陣線上的，而殖民地的各種社會運動也是由兩造共同合作發動。但是

²⁷ Peter Burke, *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 p. 84.



假如在殖民地當中，處於被統治的民眾，又二分爲知識份子及下層民眾，而彼此的理念又不盡相同的話，那麼研究分析將會複雜的多。

如果用此論點引至《台灣民報》中關於宗教信仰的概念上，殖民統治者對於下層民眾所實行的霸權與社會控制，是透過放任或是鼓勵台灣民間信仰的方式，使民眾醉心於迎神賽會中的歡愉氣氛，而忘卻被殖民的痛苦；而一方面，殖民政府又透過嚴禁文化劇的手段，來鎮壓知識份子的反日情緒。殖民政府一方面獎勵迎神賽會，一方面壓抑文化劇，對當時的知識份子來說，其實是一種的社會控制和霸權作用。

但是，弔詭的是，社會真正的結構是由下層民眾所組成的，下層民眾對於殖民政府籠絡政策甘之如飴，真正進行反抗的卻是屬於中間階層的一小撮知識份子；然而，他們卻又因爲憎恨民間的宗教信仰，而與下層民眾背離，一方面卻又反抗殖民政府的統治，若以Peter Burke的說法，反抗運動是下層民眾對於上層民眾霸權的反抗，那麼，知識份子究竟應該屬於Peter Burke二分法社會中的哪一群？

對殖民政府來說，下層民眾與知識份子，都是屬於殖民地的一群，他一方面利用民間信仰來籠絡民心，一方面又壓抑文化劇來遏止抗日的情緒，但他最終的目的，都是一樣的，即是要達到他社會控制的目的。但是對於知識份子來說，殖民政府鼓勵迷信，鎮壓新文化活動，對他們而言，他們的訴求被壓抑，是殖民政府對殖民地所進行的霸權與社會控制。只是，令他們傷心的是，身爲殖民地最基礎的一群人，也就是庶民百姓，卻又掉入殖民政府的技倆之中，瘋狂地舉辦各式的宗教慶典，對知識份子的大聲疾呼視若無睹，以至於讓他們走入裡外不是人的境地。

五、結論

台灣民眾對於台灣民間信仰的崇拜由來已久，始自清代的移民社會，那是漢人社會生活中所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即便是到了改朝換代的日治時期，



對於台灣民間信仰的舊慣習，依然根深蒂固。一方面，也因為日本殖民政府攏絡民心、腐化社會風氣，以便坐收殖民之效，因而使傳統的民間信仰與宗教活動，在日治時期反轉而鋪張、擴大。日本殖民政府的措施，也引來了捍衛台灣的知識份子不滿，他們藉由辦報，一方面攻擊殖民政府、一方面藉機匡正社會風氣，不欲讓殖民政府的手段得逞。

因此，在《台灣民報》之中，對於宗教活動的報導，普遍地抱以否定的態度。知識份子認為那是迷信的、浪費的，殖民政府所利用來腐化民心的、引起社會不安的，透過各式各樣的活動，知識份子們鼓吹消弭迷信，嚴禁低俗的文化，以建立一個高品質的新文化，因而有了新劇運動的產生。這樣的論點，在Peter Burke (*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 的概念中，可以運用「霸權與反抗運動」方面來闡釋，他們以為，宗教信仰是統治者針對被統治者所進行的社會控制，透過攏絡民心，來強化其統治基礎，而《台灣民報》便是為了破除迷信而發聲的反抗運動。

然而，*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一書Peter Burke的概念中，應用在《台灣民報》中關於民間宗教活動的議題上，也有著侷限性。因為在理論之中，僅只強調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二元的關係，在《台灣民報》當中，卻有知識份子的立場。那種既不是統治者，對下層民眾文化又深惡痛絕的中間份子，就史實來看，其實有著長遠的影響，地位亦不容忽視，因此，日治時期台灣的殖民社會，無法用Peter Burke二分法的理論清楚地加以闡述。

